

“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是一个自然过程

Grace

当某一种现象超越了人们的认知能力或认识范畴的时候,就会把它称为是一种“极端”。以一个简单的现象为例,关于宇宙大小的问题,人类实在无法找到甚至无法想象宇宙的边界是个什么样子,所以就把这个极端的自然现象称为“无限大”,又发现宇宙是由原子电子夸克胶子等等极端微小的粒子组成的,实在无法看到甚至无法想象粒子还能怎样小,这又进入了另一个极端的自然现象之中.无限大的宇宙是由无限小的粒子组成的.在探究宇宙起源的过程中,发现当今无限大的宇宙是由当初一个无限小的物质爆发出来的,实在说不清,也就是说宇宙诞生的过程是“从一个小的不能再小的极端走向另一个大的无法再大的极端”的自然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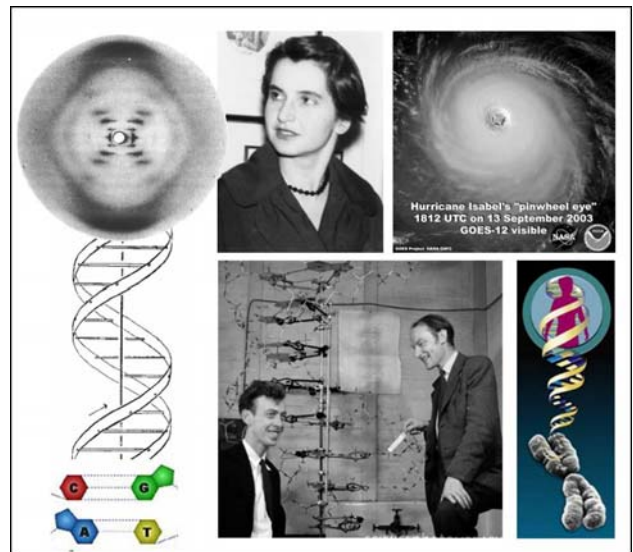
再举一个与我们自身有关的例子,人脑的“思维”是不是有一个边界的问题,人类也实在无法找到甚至无法想象“思维”的边界是个什么样子,认为人类的思维是无边无际无限的,也是自然界中的一种极端现象.在研究人脑思维(人类智慧)起源的过程中,发现每一个人脑都来源于一个比针尖还小的分子DNA,这个旋风一样结构的分子只有四种核苷酸组成,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了,除了原子电子夸克胶子等等极端微小的粒子外,再也化验不出任何其它东西了。就是说每一个人脑思维(人类智慧)诞生的过程也是“从一个小的不能再小的极端走向另一个大的无法再大的极端”的自然过程.

上述这两个从极端到极端的事件过程,都不是人类所为。往大了说,星际间的秩序不是人类设计推动的,甚至人类还根本不知道从哪里可以搞到足够的泥土和石块去堆积一个行星,更不用说太阳了。往小里说,我们自身微观细胞世界中DNA中的超复杂程序和信息也不是人类编写制作的,甚至人类还根本不知道黑猩猩DNA与人类DNA的哪些差别导致了人类可以产生文化,而黑猩猩只会爬树玩耍。所以在自然界中,这类“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现象不是一种人为的坏事,而是一种和谐的必然,所谓极端仅仅是相对于人的认知能力而言的.

如果说智慧来源于大脑,而大脑又来源于DNA,那么DNA就是人类发现的最为奇妙的东西了,DNA到底来源于哪里呢?寻找DNA的起源是科学界义不容辞的大事之一。

在1944年,人们证实了DNA就是遗传物质,也知道DNA分子是由四种核苷酸组成的长链分子,但是还不知道DNA链的具体细节。到了1953年,Puling和Corey构建了一种模型,说DNA由三条链螺旋而成,磷酸在轴心,碱基在外层。Fraser也构建了一种模型,

说DNA由三条链螺旋而成,磷酸在外层,氢键将碱基维系在轴心。他们离DNA分子的正确结构只有一步之遥了。就在这时,美国23岁的Jams Watson来到了英国Francis Crick的实验室研究DNA分子结构。恰逢英国32岁的女学者Rosalind Franklin拍到了一张清晰的关于DNA分子的X-光衍射照片(图,看上去简直就是一个旋风横断面的卫星照片)。受到这张照片的启发后,Jams Watson和Francis Crick很快建立了一个模型,说DNA不是由三条链而是两条链螺旋而成,磷酸在外层,氢键将碱基维系在轴心,将两篇共三页文字的论文在1953年4月25日和5月30日的自然(Nature)杂志发表。他们构想出来了关于DNA分子结构的正确模型,就是由四种核苷酸连接构成的一个旋风柱(图)。因此Jams Watson和Francis Crick步上了1962年的诺贝尔奖的领奖台。此后50年中虽然得到了巨额的研究经费资助,但他们再也没有重登那个领奖台。人们找到了DNA是一个不小的成功,但还没有找到DNA的起源,甚至连一点线索都没有,所以有人干脆设想DNA来源于外太空的某一个地方。



在2003年4月举行的庆祝发现DNA 50周年的活动中,74岁的James Watson告诉伦敦电讯报:“当你每一次明白一件事,宗教就变得不太可能”。他认为DNA结构的发现已经帮助了推翻对圣经中上帝的信仰。这是笔者所知道的唯一将自己的科学成果直接用来否定上帝的科学家,哥白尼牛顿达尔文爱因斯坦都未曾这样做。从他的观点可以看出,似乎人们已经找到DNA的起源,但事实并非如此。

既然如此，有一种特殊的情景也许就会发生，请允许假设如下：如果 Watson 教授能有机会偶然读到圣经以西结书（Ezekiel）第一章的文字，并且与他自己在 1953 年发表的文字相比较，对其中存在的惊人的对应巧合部分发表一点看法，谈一点真实的感受。如果说的真切，一页文字就可能把他送上另一个领奖台，Templeton 奖，这是专门奖励那些对科学丰富人类信仰做出突出贡献的知名个人。

为什么呢？因为 Watson 等人的发现与一段圣经文字发生了“意外”巧合，使得持无神论观点的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圣经文字的来源，使得用 DNA 来否定“圣经中的上帝”变得更加困难。

在圣经以西结书第一章的近一千字的描述中，Watson 教授也会发现有四十处都与 DNA 分子的特征形成了对应巧合。例如，其中的第一句话是这样概括的：“... a whirlwind came out of the north, ... Also out of the midst thereof came the likeness of four living creatures. ... they had the likeness of a man” (Bible, KJV, Ezekiel 1:4-5)。基本意思是：他看见在一个“旋风”中由“四个活物”构成了“人的形象”。

圣经中的这段文字困惑人类已经有两千六百年了。其中最令人不解的是，为什么圣经中的上帝硬要将一个“旋风”“四个活物”和“人的形象”这三个毫不相干的事物捏合在一个画面之中让 Ezekiel 看呢？两千六百年过去了，没有人能够通顺地解释“一个旋风”和“四个活物”有什么干系，“四个活物”与“人的形象”又有什么干系。有幸的是，James Watson 等人对 DNA 分子结构和功能的发现表明一个事实，世界上的每一个人的自然结构“形象”都是由一个“螺旋”DNA 中的“四种”核苷酸编码出来的，无一例外。即使天地都废去，这个规律似乎也难以改变。自然界中唯有 DNA 分子能够将一个“旋风”“四个活物”和“人的形象”这三个毫不相干的事物捏合在一个画面之中。这个事实与圣经这段文字是一个天衣无缝的“巧合”，这个意外事件为判定 DNA 的起源提供了意想不到的线

索。

笔者感谢 James Watson 等人发现的事实，这不仅能够完美解释为什么上帝在圣经里硬将一个“旋风”“四个活物”和“人的形象”这三个毫不相干的事物捏合在一个画面之中，还能够完美解释“一个旋风”和“四个活物”与“人的形象”到底有什么干系（图）。同时也为 DNA 的真正起源提供了无可推诿的“证据”。

上述这个假设显然存在一个致命的难题：在没有任何科学仪器和理论的两千六百年前，看到 DNA 分子（或影像或梦像）的可能性是零，除非这真是上帝行的一个“神迹”。但是对于一个理性“健全”年近八十的无神论人士来说，Watson 教授能够为这个“神迹”而说真话吗？

如果说真话，就意味着 DNA 结构的发现正在帮助人们对圣经中上帝的信仰，而不是被用来“推翻对圣经中上帝的信仰”。

如果说真话，就意味着他自然而然地从一个进化论的极端走向了另一个神创论的极端。

如果不说话或者说假话，就意味着他自然而然地从一个诚实的极端走向了另一个虚伪的极端。

可见“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是一个极其自然的过程。其实每一个诚实的人面对这个“神迹”，如果说真话，不说话或者说假话，都意味着他自然而然地进入了这个自然的过程。

笔者认为，无论 Watson 教授是否能有机会偶然读到 Ezekiel 第一章的文字，都不改变这个事实：DNA 结构的发现不仅帮助人们揭开了 Ezekiel 文字中的千古之谜，而且也是一个千年不遇的“证据”：科学不仅能够丰富信仰，也能够证实人们对圣经中上帝的信仰。

（关于细胞染色体，DNA 分子，线粒体能量代谢系统和细胞凋亡等生命中最重要环节与圣经文字的系列“巧合”关系，请参阅张东生的系列文章，<http://xkxy.org>）。

2007-10-31